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五周年。同时，今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世界各国都以不同形式纪念。然而，在种种政治姿态或外交博弈的背后，我们更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人类真的从这场战争中汲取足够教训了吗？同样的错误我们真的不会再犯吗？当我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这场空前悲剧进行再反思时，能否得出新的启发和出路？

百年前人类对“一战”的处理及其后果

1918年11月11日，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东德车站，垂头丧气的德意志帝国政府代表埃尔夫贝格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签署停战协定，正式宣告德国投降。停火协议于六小时后生效。而在此前的四年零三个月中，这场原本起于欧洲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来自三十多个参战国的15亿人被卷入战争；战死军人达900万，2000多万人受伤；战争期间平民伤亡达1000万人。

《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的签订，宣告德、奥、土、保同盟国集团的彻底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根据该协定，德国必须在15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从法国手里强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莱茵河左岸地区全部撤军；同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德国也须从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及非洲撤军。作为战败国，德国必须交出5000门大炮、25000挺机枪、3000门迫击炮、1700架飞机、5000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和5000辆卡车。

从这一刻起，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都开始了长长的反思：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爆发的？这样的悲剧人类又当如何避免？

作为对一战爆发原因最权威的总结，以及这种权威总结最直接的制度性产物——“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在建立之时曾被人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够从此一劳永逸地“终结战争”，为欧洲、为世界带来持久甚或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然而，正如此后爱德华·卡尔在其名著《20年危机（1919—1939）》中所尖锐批评的那样，被寄望于缔造持久和平的战后安

排不仅未能延续现状，反而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浇灌出民族复仇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的恶之花。

同样，作为该体系重要副产品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虽然它的生命一直延续到1946年4月，即二战结束后才被解散，但在1930年代中期的鼎盛期之后，便随着德意日战争铁蹄的迫近而早早淡出历史舞台。

国联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在国联存在的26年中，它的确曾协调、处理过一定国际争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以及大国的背书，因而在制裁个别成员国侵略行径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都没有太好的印象——前者往往被冠以“分赃大会”的头衔，而后者则被作为贯彻列强分赃决议、压制或者迷惑广大弱小国家的“遮羞布”。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在山东问题上为绥靖日本而无耻出卖中国利益。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无所作为——尽管他们在调查过程中还算客观公正地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真相，但国联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既无意愿更无行动去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终于，在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及在其基础上撰写并公布的《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沦为废纸。当然，中国人民也从这两张“废纸”中习得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弱国无外交。

事实上，在一战结束后的那二十年时间里，痛恨该体系与国联的国家也不止徒有“战胜国”之虚名的中国；“战败国”的愤恨尤其强烈。此

外，脱胎于战胜国沙俄的红色苏联在2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一直遭到国联的孤立，因而也予以对等抵制作为战略回应。

总而言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不仅未能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在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战胜国彼此之间、列强与弱国之间不断制造出新的冲突，为未来的残酷大埋下仇恨的种子。当二战的隆隆炮声响起时，幻想通过该体系来消弭战争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但悔之晚矣。“这不是和平，这不过是20年的休战”——法国元帅福煦如是说。

百年来人类仍在不断重复“一战”的错误：联盟对抗

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人类社会先后见证了“20年危机/休战”、空前残酷的二战、旷日持久的“冷战”以及虽无世界大战却地区冲突不断、“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30年后冷战时代”（1989—2019）。人类的愿望或许是一个好的，但事实真相总是残酷的。在一战结束后的一百年里，人类的和平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根本上讲仍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重复着当年的故事，犯着相似的错误。

作为对一战痛苦回忆的理性反思，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应运而生。这门学科最初的研究者们主要分布于大西洋的两岸。在他们的早期探索中，大国间的“联盟政治”被广泛认为是造成一战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有学者们认为，恰恰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欧洲大国军事联盟的形成与反复动荡，终于酿成了1914年的大危机。

早在1882年，成立十年的德意志

第二帝国即拉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建立“三国同盟”，也就是后来一战期间的“同盟国”的前身。作为应对，“总是成对出现的军事同盟集团”——英、法、俄三国在1892年到1907年的15年间，逐步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议，组成了日后“三国协约”的雏形。

就此，两大军事集团正式成立，并拉开架势。台已搭好，幕已拉开，只欠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所以，“在各方的久久期盼下，战争终于如愿以偿地爆发了”——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炽热的战火仿佛一瞬间让所有摩拳擦掌的人们都获得了解脱。

然而，就在各国民众欢欣鼓舞地送走自己的丈夫、儿子，满心以为在圣诞节之前他们就能够赢得这场“必胜”的战争并凯旋归来时，没有人会料到，一架架绞肉机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们。从马恩河到凡尔登，从索姆河到日德兰，从陆地到海洋，再从海洋到天空，欧洲人的鲜血不仅断送了他们的全球主导地位，促使“世界霸权从欧洲大陆向其两翼转移——向东到苏联，向西到美国”（史家时殷弘语），更给几代人的心灵带来终生无法祛除的阴影。

然而，有道是“知易行难”——欧洲人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教训。无论大西洋两岸的国际关系学者或者政界的有识之士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解，都无法遏阻欧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走上结盟对抗的老路、邪路。于是，秣马厉兵、卧薪尝胆的德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欧其为沼矣。

当二战结束的黎明到来时，人类以为从此世界终将和平。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当冷战行将终结时，有西方学者为之鼓与呼：“历史已然终结！”然而“9·11”的滚滚浓烟、中东的颜色风暴、世界

各地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无疑在向世人宣告：和平仍远未到来。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再反思

有学者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在1949年后终于站了起来，并用自己孱弱的军事工业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此后七十年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大国的尊严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中国人民在四十年前明确认定“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题，并郑重选择走改革开放道路时，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她的抉择本身就是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巨大的正能量。

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今更加自信地大步迈入“新时代”。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6月份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以及对世界人民捍卫和平的愿望，既带来新机遇，也制造了新挑战。面对这样的大变局，有的国家选择了走向封闭，试图用双边谈判的手段取代多边主义，而双边手段背后的精神实质则是极端的单边主义——极端地追求本国国家利益，而全然不顾他国合法权益及国际社会的公益。

一战、二战爆发前的西方大国，其领导人也说着似曾相识的话语，高举“本国第一”“民族利益至上”的旗帜，毫不羞愧地以此为由在国内攫取选票，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玩弄纵横捭阖的权谋之术。

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出路究竟在何方？如何从根本上消解战争？怎

样才能不让悲剧重演？答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哲理层面，习近平主席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事实上，不论人们愿意或不愿意承认，我们实际上都已经身处“类”的统一体系中——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因此，也只有从“类主体”出发，坚持命运共同体思维，人类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

在上述哲理认识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主张“普遍安全”这一全新安全理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安全领域面临多重考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更不可能像一战战前那样，通过军事结盟、在国际社会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来获得可持续的安全——那样只能重蹈一战的覆辙。我们今天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新审视历史、反思一战，终于发现一种全新的全球安全治理之道，那就是“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唯有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才有可能建成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理，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我们摒弃一战前列强之间的普遍做法——零和博弈、以邻为壑、保护主义、高筑贸易壁垒，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公平贸易、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把全球的经贸往来重新带回“正和博弈”的正轨上来。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今天反思一战，需要从中汲取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以实际行动加以改变。否则，如果一面声称反思，却在行动上亦步亦趋、步其后尘，则恐怕人类社会还将面临危机。

世界史林

人物志

清儒颜元的实学主张与实践

□ 李伟波



颜元绘蝶恋花扇面

明清之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中，北派大儒颜元可谓其中最突出者。颜元，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他所构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体系旨在扭转宋明儒学静敬穷理的内在向度，重彰原始儒学淑世济人的外王事功面向。

回归周孔正学

明亡清兴的易代之变促使儒者们重新审视宋明儒学。颜元亲历亡国之痛，深切体察到理学与心学积弊之害，梁启超称其是最为彻底的旧学反对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故而力倡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绩之学纠正宋学之虚理、浮文、空言，誓做斡旋乾坤的“转世”之人，展现出儒者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感。

颜元走上经世实学之路并非一朝之事，而是历经由陆王心学转向程朱理学再转向周孔正学的思想历程。24岁至26岁间，颜元笃信陆王心学，以陆王为孔孟之正道，并手抄《陆王语

要》一册，其时人有“真陆王”之称。26岁时，颜元得见《性理大全》，以为程朱理学较陆王心学更为纯粹，遂以程朱为孔孟正道。34岁时，颜元为养祖母守丧期间恪守《朱子家礼》，几至病饿而死，始觉理学有违人之性情，“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就此省思程朱、陆王之学并非孔孟真传，因其杂染佛老而流于玄虚支离，自此幡然改志，一槩推翻宋明理学与心学，反身直追周孔之正学，力复前圣之故道。

康熙三十年（1691年），颜元57岁时南游中州，“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深感理学固弊贻害尤甚，如果说之前颜元尚有将就程朱之意，此次南游则成为他决然廓清理学之弊的转折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自此转向以重续原始儒家道统命脉、重塑清初儒学形态为职志的实学之路，开创了习行事物的践履之学，余生致力于复明原始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生命实践。

人皆可以为尧舜

宋明儒者“存理灭欲”“静敬穷

理”的内在超越路向必然坠入空疏不实，究其根源在于本体论上“理在事上”“理在气先”的超验之理。与之相对，颜元从自然主义的气本论出发辨析理事关系、理气关系，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一致”的经验之理，并以性一元论取代程朱的性二元论，所谓义理之性便是气质之性。颜元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善是自我德性涵养的根本，“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者，即气质也”。“恶”是由于私欲遮蔽了善的本性，经过一番“践形尽性”的祛蔽工夫仍可恢复本然之善性。人性本善的理论预设赋予普遍百姓成圣成贤的可能性。

在成圣的可能性上，颜元的圣人观与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极其相似。而在成圣路径上，二者却大不相同。阳明认为圣庸只在一念间转换，颜元则认为成圣路径唯有立志习行。圣庸之间即便存有先天禀赋不同的气质差等，或聪慧或愚钝，然其根本差别却在于是否用功。不肯下工夫的圣人终究会沦为庸人，肯下工夫的庸人亦可跻身圣人一流。

颜元并不刻意追求圣贤之全体大用，而是注重圣贤见用于世的现实性、有用性。在他看来，拥有一门切实有用的专门性知识或技能，便称得上是偏至之圣贤。他依弟子禀赋差异各尽其长，将其培养为或精于礼、或精于乐、或精于射、或精于兵、或精于农的经世之

才，此种圣贤判定标准使得成圣之路更富有普遍性和人间性。

学成内圣外王之德

原始儒学是以实践为表征的内圣外王之学，注重自我德性涵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融通。宋明儒者一味强调修身的内在理路导致外王事功层面的偏失，对此颜元提出了“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的救世主张，希图把宋明以来旁落的外王事功层面彰显出来。

颜元从人的自然生命本身出发，引导儒者挺进身体力行的实践之路，从宋儒静坐讲读的文墨世界转向利济苍生的事物世界，习行尧、舜、周、孔的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他尤为推举关乎儒者修德立业的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水、火、工、虞等笃实切近的实用性知识技能，以期“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

颜元认为宋学虚浮的根源在于偏重穷理尽性而轻躬行践履，理学家持重德性涵养而少言事功经济，心学家诉诸易简工夫而反身向内，以至于“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为此颜元转向主动习行的身体实践路向，从对“格物”的解释入手，将致知方式由宋儒的内在心性涵养转向外在的具体实践。与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万理具于一心”，王阳明释“格物”为“正”的内向化解释倾向不同，颜元解“格”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有犯事实做之义，认为凡事必须亲身实践一番方能习得，“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他以学琴为例说明熟读琴谱与亲手抚琴而奏之间的习得差异，注重将儒家之道落实于日用伦常的躬行实践，力求在习行事物的生命实践中成就一番匡时救世的实绩功。

与此同时，颜元并未放松自我内

在德性涵养的修身工夫，每日谨行一套严苛繁琐的常仪功，行拜先祠、拜父母、夫妻之礼以及出告反面之礼，每日以日谱记录功过，并与友人互勘，以此作为自我改过迁善的重要修身工夫。颜元的日常修身实践，体现了自我省躬的道德严格主义。

教成一班治世之材

颜元不仅要突破宋明的学术形态，还要突破传统的书院教育理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时年62岁的颜元受邀赴桐乡县主持漳南书院，书院以“宁粗而实，勿妄而虚”为设计原则，以“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为教育宗旨，以期培养经世济民的实才、实德之士。

漳南书院尤为注重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技能力学教育，以及射击、骑马、举石、击拳等体育课程，《习斋记余》记载颜元常率弟子“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肆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知识教育和技能实践结合的教育模式展现出漳南书院德、智、体兼重的教育特色，在明清书院教育史上可谓别开生面的创举，显示了清初学风崇实黜虚的新动向。

颜元的实学思想在民国之初备受梁启超、胡适的肯认与弘扬，梁启超称其“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胡适称其为“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亦极为推举，专门成立四存学会，编辑出版《四存月刊》《颜李丛书》，颜李学在近代一度得以复兴发扬。毛泽东自述曾受颜元实学哲学之影响，所言“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与颜元“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一脉相承。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亦引用颜元之语：“圣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借此勉励青年久久为功，在为学为人方面坚持做日日工夫，日日工夫是判定最终成为圣人或庸人的分水岭。力行实践，肯做工夫，可以说是清儒颜元留给后人实实在在的人生智慧。